

中国古典文学精华丛书

寓言精华

张志烈 干天全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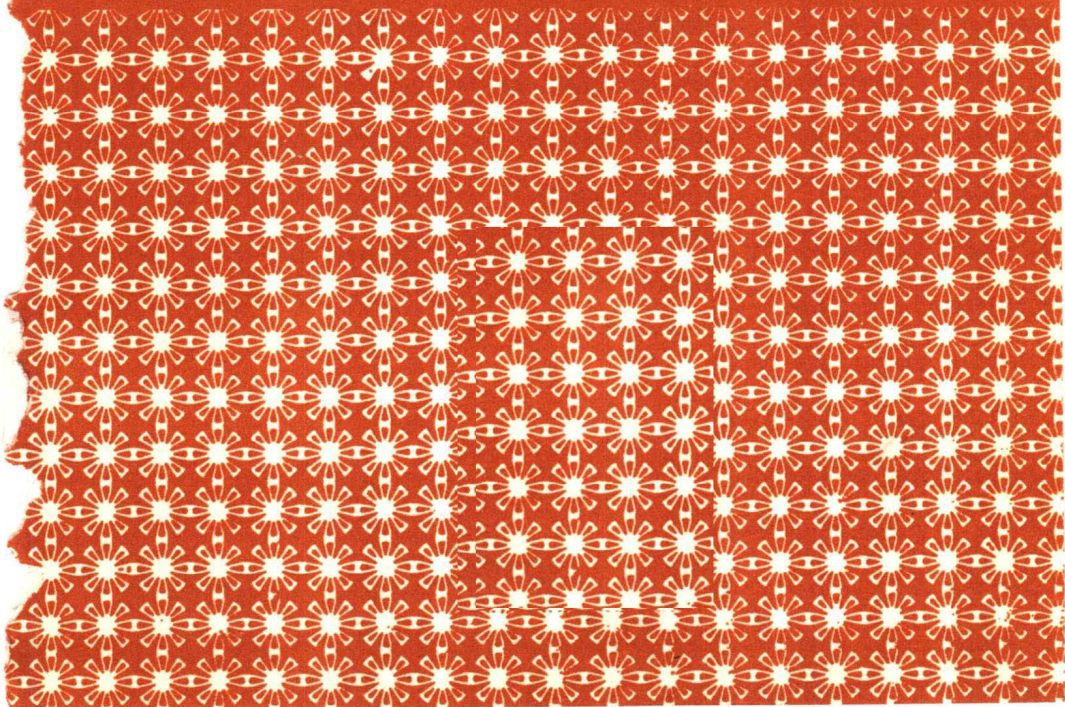


巴蜀书社

张志烈 干天全 主编

寓言精華

巴蜀書社



责任编辑:何 锐 罗 红
封面题签:顾易生
封面设计:梅定开

寓言精华

张志烈 干天全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1 字数 350 千
1998年 1月第一版 1998年 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7-80523-817 0/I·333 定价:20.00 元

前 言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世界寓言史上也有其显著地位。中国、希腊和印度被世界文坛公认为寓言的三大发祥地。

自先秦到清末，有许多寓言作品问世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寓言在我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不是始自先秦。被今人称为“先秦寓言”的一大批作品，在当时既没有独立成篇的作品存在，也没有“寓言”这种专门文体和称谓。“先秦寓言”于先秦“诸子散文”是一种寄生关系。游说诸侯、阐述自己政治主张和思想见解的诸子散文在先秦已成为一种成熟独立的文章体式，而“先秦寓言”仅是诸子散文中进行说理论辩的例证。最早出现在《庄子·寓言》中的“寓言”一词，也并非是指文体的称谓，仅指文章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释文》解说：“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庄子所说的“寓言”，是指假托别人所说的话，即寄托之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也就是说庄子假借别人之口“寓言”，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十言九信的效果。他所说的“重言”，意为庄重之言也就是直接论述作者观点的正言。而“重言十七”，其效果是不及“寓言”的。庄子并没有将“寓言”视为一种文章体裁，也没意识到“寓言”是可以发展为一种独立成篇的文章体裁。然而，《庄子》中大

量“藉外论之”的“寓言”就其本身的内容及特征来看，已是今人所谓的寓言。如《鲲鹏和斥鴳》、《庖丁解牛》、《东施效颦》、《埴井之蛙》等等，有谁不承认它们是典型的寓言呢。正因为如此，今人才将先秦诸子散文中与《庄子》“寓言”同类的内容抽出，加上篇名，列为独立的篇什，并将寓言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称谓。

纵观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作品，寓言虽然客观存在，但从先秦到清末，寓言都不是以寓言的称谓出现的。《韩非子》大量的寓言被集中在《说林》和《储说》里，称之为“说”。刘向在《别录》里称“寓言”为“偶言”，认为“偶言者，作人姓名，便相与语”。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把“一鸣惊人”、“海大鱼”等寓言归进“谐隐”一类，将“愚公移山”归于“踳驳”类中，在他看来，“寓言”当为“滴譬以指事”的“隐言”。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将古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寓言翻译为“譬喻”，如《百喻经》、《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等等。唐宋及以后历代的寓言，也多被作者名之为“说”、“戒”、“言”等等。《伊索寓言》在明末传入中国时，其译本被称为《况义》。历代寓言不仅没有统一的称谓，作为独立的文学品种也是不算早的。唐以前的寓言都夹杂在散文、笔记和其它典籍之中，到柳宗元写出《三戒》，中国寓言史上才出现第一次创作了自标篇名、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而作者及时人并未将《三戒》称之为寓言。唐代及唐以后历代寓言作品，也依然有不少融合在其它体裁的文章中。作为寓言专集，中国古代寓言史上只有一部以寓言称之的书，那就是唐代张太玄的《平台百一寓言》三卷，此书在《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上都有记载，但可惜早已失传。此书虽称之为“寓言”，但是否为今人所谓的寓言，已无据可考。从今天还能见到的最早的寓言专集当属《艾子

杂说》，此书被前人题为苏轼所撰。而这本寓言专集也未被冠以寓言之名。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古代的文人难以为寓言这种源远流长、存在方式不一且称谓复杂的文学体裁统一定名，并确定其概念。这就自然影响到历代文人对当代寓言的归类结集。面对浩若繁星、璀璨夺目的寓言，从先秦到清代竟没有一本断代的或跨代的寓言专集，更没有一部寓言专史或一部寓言专论。直到1917年，才出现中国古代寓言的最早选本《中国寓言（初编）》，此书为茅盾（沈德鸿）先生编辑，内容仅限秦汉时代的寓言。在中国，把历代名称繁多的寓言作品统一名为寓言，其时也不会早于本世纪初。而我国第一部研究寓言的专著《中国寓言研究》（胡怀琛著），是在1930年才出版的，第一部寓言专史的书《中国古代寓言史》（陈蒲清著）则出现在本世纪80年代初。寓言称谓的确立及主体的定位、寓言作品的集成、寓言史的梳理、寓言理论的研究，比起寓言的产生和成熟都大大滞后，这对后世辨识、钩沉和整理古代寓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从本世纪已整理出版的断代寓言专集和历代寓言总集来看，整理者辨识的标准不尽统一，有的认为寓言无体不包，选文过宽，几乎包括一切文体中有寓意的作品，如把《易经》中的某些带比喻的爻辞，从《诗经》到近代诗歌中的寓言诗，史籍中带有比喻性的传说人物故事，以及把带有寓意的一些传记、杂文、志怪小说、笔记小说等整篇当作寓言选进专集。有的则选文过窄，将一些属于寓言的作品排斥或遗漏在外。选文过宽或过严，反映出对寓言这种文学作品的概念和范畴的不同理解。要对历代名副其实的寓言作品进行整理编选，就应有一个不带偏颇认识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客观的寓言概念基础上的。根据我国寓言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状况与寓言取材、表现手法等特点，《辞海》将

寓言的概念界定为：

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有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如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已经盛行，如《庄子》和《韩非子》等著作中都有不少寓言。

这个界说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寓言作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要求的故事是带有劝喻或讽刺性质的故事，而不是一般褒贬是非善恶的故事；要求有故事，就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比喻或格言、警句式的议论所能代替的。

第二、作品的结构大多简短。寓言故事的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人物关系或拟人关系也较单纯，不需要复杂多变的结构形式。篇幅稍长的少数寓言，其结构比一般短寓言的层次略多，但也并不错综复杂。否则，就会混同于小说之类的文体。寓言属于简单的故事，故结构也应简短。

第三、寓言故事的主人公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般文学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是人，而寓言既可以是人，又可以是有生物和无生物，这反映出寓言虚构性的特点。

第四、寓言的主题（寓意）表现离不开借喻这种形式，须以故事为喻体，以寓意为本体。这和一般的比喻形式不同，寓言的故事作为喻体有情节，而一般比喻没有情节。寓言故事和一般故事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有比喻寄托，后者没有。

单独以上面哪一条去作为评选寓言的定义，都难准确地界定寓言，但从四个方面去衡量，就能比较客观地把握住认定寓言的标准，从而比较准确地对古代寓言进行辨识、整理和编选。

中国古代寓言的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前人已作了不少艰苦努力的发掘工作。近百年来，寓言的集成，寓言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在寓言的产生和分期问题上，不同时期寓言的承启关系、地位价值的问题上以及编选寓言的宽严问题上都还存在不少分歧的认识和作法。廓清以上问题并作进一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寓言的产生，和神话、诗歌一样，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寓言的孕育过程始于何时，因其起源于民间，没有文字资料可考难以定论。就以文字记载而论，也没有充足的依据。寓言理论界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是以严北溟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 11 世纪的殷周之际。他认为《周易》中的某些爻辞，如“羝羊触藩”、“困石据蒺”、“窒井碎瓶”等等，“将它们看作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权舆，不算过份。可以说，我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初具雏形的时期，是在三千多年前，较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伊索寓言产生的年代，还要早过五百多年”（《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另一种是以公木、陈蒲清先生为代表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 6 世纪的春秋末期，将《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 597 年）的“牵牛蹊人是田”、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的“老人结草”、昭公二二年（公元前 520 年）的“雄鸡自断其尾”等作为中国寓言形成雏型之依据。陈蒲清先生对前一种意见持不赞成态度。他在《中国古代

寓言史》(湖南出版社1983年版)中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爻辞还只是一种比喻,没有什么情节。前者以公羊撞在篱笆上,不能进退,比喻人们一时的艰难处境;后者连用三个比喻,形容人们的困境。这类爻辞在《易》中并不罕见,把它们作为寓言是不够恰当的。”他认为“老人结草”应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寓言。其理由是,宣公十五年“魏颗嫁父妾”(即“老人结草”)显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具有较强的寓言色彩。

以上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不能笼统地认定孰是孰非。前面说过,寓言的孕育到产生必经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第一篇真正称得上寓言的作品诞生以前,寓言只能是以萌芽和逐步生枝长叶开花的形态出现,不可能突然萌生突然结果。而这个孕育成长过程是需要吸取营养的。吸取没有文字记载的有寓意(哪怕只有一点)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营养,吸取有文字记载的有寓意(哪怕也只有一点)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营养,甚至吸取符合寓言需要的语言及表现手段的营养,加上寓言始作俑者及相继效法者的合力创造,才最终产生出战国时期成熟的寓言之果。从这种认识的角度来看,《周易》里“羝羊触藩”、“履虎尾”等爻辞内容应是寓言成熟过程中所吸取过的营养。如果不单纯地将它们视为寓言的“营养”,而将它们视为寓言的胚胎亦可,视为雏形尚早了一些。将它们与公元前6世纪已成熟的古希腊伊索寓言相提并论,并断言比伊索寓言还早五百多年,则更是不切实际的。将《左传》中“牵牛蹊人是田”、“雄鸡自断其尾”等视为寓言的雏形,理由更充分一些。它们不仅具有了比喻劝诫的性质,并具有了一定的情节,当然还不具备成熟寓言需要的故事。至于将“魏颗嫁父妾”(即“老人结草”)作为中国最早的寓言,这个看法恐难以成立。这个传说故事的内容如下: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颖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颖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及辅氏之役，颖见老人结草以元杜回，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治命，余是以报。”

这应是一篇传说故事，而不是寓言。故事的基本内容是魏颖根据父亲生病清醒时而不是病重迷糊时的遗嘱嫁父妾，表现从治命不从乱命的故事主题，其情节只是为了印证魏颖“善有善报”或者说印证从治命不从乱命才会有好结果。且不说“老人结草”体现的是极不现实的因果报应，不应算作寓言的必然寓意，就说将它作为寓言的喻体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个传说故事的主体是魏颖嫁父妾，而不是老人结草。将这个故事作为中国最早的寓言，是没有说服力的。

按今人的寓言概念，要考证出哪一篇寓言称得上中国最早的寓言是很难的。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寓言发展到春秋时代开始成形，乃至战国，才成熟并成兴盛之势。战国的列国诸子已自觉广泛地运用寓言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服务，而那些包含在诸子散文里的寓言，有的为当时所记，有的为后世辑撰，难免还有不少佚文。因此，要认定谁是最早的寓言是很难的，正如指出哪一首诗是中国最早的诗一样不易。根据可考的文献，我们认为将产生寓言的总体认识归纳为起源于殷商，成形于春秋，成熟兴盛于战国就行了。对寓言发展的分期，我们划分为先秦寓言、两汉寓言、魏晋南北朝寓言、唐宋寓言和元明清寓言五个大的历史时期。

先秦时代寓言 今人所谓的前秦寓言，实际上指的

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寓言。先秦这个历史概念包括了上古、夏、商、周、春秋、战国这些历史时代。先秦能留传下来的寓言绝大多数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战国时代，七雄纷争，合纵连横之士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为了增强论辩效果，诸子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游说诸侯时，大量引用各种有寓意的历史事实和民间故事，并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论辩需要进行了创作，于是寓言便成功地被运用，并成了诸子阐理论道的普遍手段。先秦诸子著作，除了《老子》、《论语》之外，无一不运用寓言。《孟子》用它宣扬儒家的“仁、义、理、智、信”；《庄子》用它宣扬道家的“顺应自然”、“清虚”、“无为”、“齐生死，等得失”；《墨子》用它宣扬墨家的“尚贤”、“节用”、“非攻”、“兼爱”；《尹文子》用它宣扬名家的“名”、“实”；《韩非子》用它宣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和专制统治；《吕氏春秋》杂取众家之说，用它宣扬自己的实用主义主张。记录纵横家大量言行的《战国策》里也有不少著名的寓言，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等。可以说，先秦寓言几乎全方位地反映着诸子的学说主张，同时也反映了诸子散文善用寓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质。正如陈蒲清先生所言：“读先秦寓言等于读了一部先秦诸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史。……等于读了一部先秦诸子散文艺术史。”（《中国古代寓言史》）

先秦寓言的数量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庄子》寓言有一百八十多篇，《韩非子》寓言有三百二十余篇，《列子》寓言近百篇，《吕氏春秋》寓言二百八十余篇。《战国策》寓言五十余篇，加上《晏子春秋》、《孟子》、《墨子》、《管子》、《荀子》、《尹文子》、《慎子》等著作中的寓言，总

数在千篇以上。这比起古希腊寓言集大成的总集《伊索寓言》二百多篇的数量要大得多。先秦寓言不仅量大，艺术质量也相当高。许多作品不仅可以与《伊索寓言》、古印度寓言的精品媲美，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当代中外寓言创作难以企及的典范。先秦是我国寓言成熟兴盛、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尽管先秦寓言寄生于散文，还未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但对后世影响巨大，在中国寓言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两汉时期寓言 寓言发展到两汉，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大的收获且质量不高。秦王朝一统天下，施行政治和文化专制，政治上百家争鸣的环境不复存在，这就使依附于说理散文的寓言失去发展的基础。秦末战乱后，平定天下的汉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地位，虽然重视整理典籍和发展新的文化，但从根本上是反对百家争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成了长期的思想专制。在两汉散文、理论著作中已无先秦百家争鸣的气势和普遍使用寓言阐理说道的形式。虽然具有400年历史的两汉还留下一些寓言，但数量和质量比起先秦寓言都大为逊色。

两汉寓言总数约六百篇左右。主要见于刘向的《说苑》、《新序》、刘安的《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著作中也有少量的寓言。总体来看，两汉寓言的题材多沿袭先秦，大都局限于儒家经典和历史故事，缺乏来自民间充满生活气息的各种题材，比起先秦寓言的思想性、艺术性差距甚大。当然，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精彩寓言，如《杯弓蛇影》、《未尝知音》、《枭将东徙》、《反裘负刍》、《曲突徙薪》等。

魏晋南北朝寓言 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期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动荡不安，从汉末开始一直持续到隋文帝统

一中国。动乱的社会带来了活跃的思想。随着汉王朝的解体，儒学难再独尊，社会各层人士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曹操执政，便尚刑名、讲通脱，主张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物，老庄思想、佛教之学被发展成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士林风气为之一变。活跃的思想给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形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史》）。这个时代不仅产生了曹氏父子的创作为代表的建安现实主义诗歌，还产生了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同时，文艺理论著作得到了大繁荣，产生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影响深远的论著。

然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寓言并没得到明显的发展，其数量还不及西汉，题材上也往往因袭前人。思想的活跃，文学的长足发展，本应给寓言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但此时的寓言却为什么没有大的收获呢？薛贤荣先生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因：“其一，寓言此时尚未取得文体上的独立地位，而赖以栖身的论辩散文并不发达，四六骈文则不利于叙事。其二，直抒胸臆、悲凉慷慨的诗歌具有极大魅力，吸引了大批文人，曹丕甚至主张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那些赋训勉于诗赋的见解。这就把寓言排除在诗人视野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寓言的发展。”（《寓言学概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魏晋南北朝寓言在《笑林》中保留较多，在刘昼的《刘子》、萧绎的《金楼子》、符朗的《符子》等理论著述中及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也能见到一些。这个时期寓言的成绩虽然不大，但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这个时期的笑话丰富了寓言的表现手法。笑话为文学中的一种讽刺幽默小品，其中偏重于借事寓理的讽刺笑话往往就是寓言。魏邯郸淳的《笑

林》是我国第一部笑话专集，书中有不少以笑话形式出现的寓言，如《执竿入城》、《一叶自障》、《食笋煮笋》、《宜去葛龚》等为数不少的寓言。此书具有开创后世笑话寓言先河的意义。隋代的《启颜录》，宋代的《艾子杂说》，明代的《艾子后语》、《笑赞》、《笑府》，清代的《笑得好》、《俏皮话》等等，都明显地受到《笑林》的影响。而这些笑话专集中都包含了许多为人熟知的寓言。二是印度佛经寓言的大量传入，从题材、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给中国寓言的创作留下了新的启示。印度佛经寓言虽然属于宗教文化，但它却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其题材的丰富，寓意的深广，表现形式的活泼，文体的自成样式，并形成《百喻经》等寓言专集，这些都是可资借鉴的。在印度佛经寓言的影响下，我国的笔记小说也出现了与印度佛经寓言相似的故事，如刘义庆的《鸚鵡灭火》则明显地源于《旧杂譬喻经》或《阿育王譬喻经》。在魏晋南北朝，印度佛经寓言的传入主要是对佛学界影响较大，至于对当代寓言创作的影响并不大，但它促使了唐宋寓言的复兴。

唐宋寓言 唐宋时代是中国寓言创作开始复兴的时期，寓言的收获是比较大的。隋代的历史很短，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代文章，寓言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只有侯白《启颜录》中少量寓言像游丝连系着隋前隋后的寓言史。即使是到了初唐和盛唐，寓言的创作也并无兴旺的迹象，这个时期文学的成就主要是体现在诗歌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建树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内则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党争，外则不断受到吐蕃、回鹘的威胁，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寓言创作随着古文运动兴起，发挥着揭露社会矛盾、讽刺时弊、针砭陈规陋习的作用。唐之前，寓言寄生于诸子散文、历史散

文等其它文体之中，而至唐代古文运动时期，出现了不少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了独立成篇、自标篇名的寓言的作家，他的《三戒》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广泛。后来苏东坡作《河豚》、《乌贼鱼》二说、邓牧作《二戒——学柳河东》等寓言，都是直接模仿他的。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也有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他们和柳宗元一样，吸收先秦寓言与印度佛经寓言的创作长处，用独立的寓言形式反映中唐和晚唐的黑暗现象，深刻地讽刺了官场和社会各种腐朽衰败的时弊。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等人虽然创立了寓言这种独立的文体，但寓言并没有从此就完全摆脱寄生的地位，唐代至清末的许多寓言，依然还是夹杂于其他文体之中。完全摆脱寓言的寄生地位，当是现代之初。

唐代是散文的辉煌时代，更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寓言不仅会受到散文的影响，也会受到诗歌的影响。唐代开始出现诗体寓言，一些著名诗人都写下了这类作品。如寒山子“狗争骨”（原诗无题）。杜甫的《义鹘行》、《朱凤行》，刘禹锡的《有獭吟》、《飞鸢操》，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等，还有近代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俗赋《燕子赋》等，它们已不是古典诗歌中含通常比喻的寓言诗，而是叙事性的寓言诗。但遗憾的是这些寓言诗数量太少，也不够成熟，更没有形成规模，对当时及后代形成诗体寓言的促进都不大。在所有的古代寓言作品中，诗体寓言与散文体寓言比起来，真有如晨星与河汉之差。在西欧，情况则大有迥异，俄国克雷洛夫的寓言，法国拉封丹、德国莱辛等寓言家的寓言大都是诗体。《苏联百科全书》对寓言的定义是：“寓言是用比喻的形式来表现出人类的行为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简短故事，更多的时候是诗体的故事。”而我国的唐代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却为什么没有使

诗体寓言繁荣呢？陈蒲清先生认为：“这种情况大概跟中国寓言的传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则长于抒情，短于叙事，即使是叙事诗也以浓郁的抒情为主要线索（如《木兰诗》、《长恨歌》等），很少纯粹的叙事诗。同时，中国诗歌虽然也引用故事（即用典），但只简单点明一下，讲究暗引，不引用完整情节。这一切都使得古典诗歌与寓言的彼此关系疏远了。”这应当视为唐代已经出现诗体寓言而得不到长足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晚唐的寓言呈复兴之势，颇有佳作传世。从寓言的发展史来看，唐代寓言的最大收获就是开始了寓言体裁的独立和开始产生了诗体寓言。

结束五代十国割据的混乱时局，北宋统一后的中国虽然有过经济文化的复苏和繁荣，但和初唐、盛唐难以相比。由于朝廷错误的军事政策和官僚机构的庞大，使宋王朝国力削弱，不断受到外族的欺侮。始自北宋中叶，便不断出现改革与保守、爱国主战与卖国投降的激烈战争。经过“靖康之变”，南宋偏安一隅，国运更是日渐没落。

但宋代的词和散文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堪与唐代的诗和散文合璧，故文学史常将唐宋文学并举。宋代的寓言创作也与唐代的寓言创作相似，是随着北宋中叶的古文运动而兴起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些古文大家及宋代一些有名文人都有寓言传世。宋代寓言以苏东坡的作品最为杰出，其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庄子寓言、佛经寓言和柳宗元寓言的影响，但又具有嬉笑怒骂的诙谐特色，对后代寓言影响颇大，除了他的《二鱼说》、“傍人门户”、“小儿不怕虎”、“戴嵩画牛”、“二措言大志”、“螺蚌相语”、“口目相语”等一批寓言外，还有传为他所撰的《艾子杂说》收集了三十九篇寓言。这是我国寓言史上出现的第一本寓言专集。书中以滑稽多智的艾子作为贯穿所有

寓言的主人公，从多角度多侧面针贬了时弊，特别是尖锐地讽刺了残酷的封建专制，如《虾蟆夜哭》这一类作品。这部寓言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刘基的《郁离子》、陆灼的《艾子后语》、张令夷的《迂仙别记》等，都借鉴了它讽喻现实的抗争精神，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和以虚构人物统领全书的手法。

总的来看，唐宋寓言在特殊社会背景的影响和文学大发展的促进下，比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寓言有较大的发展，先秦以后长期冷落的寓言创作局面得到了明显改观。

元明清寓言 这个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除明代外，元代和清代都由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汉人地位低下，饱尝民族歧视和压迫。明代虽由汉族统治阶级执政，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同样实行专制。但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固，元明清统治阶级和历代统治阶级一样，也同样会利用文化来为其服务，尽管大兴文字狱扼杀“异端”文化，但并不排斥一切文化。在元明清时代，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民众的顽强反抗，各种文学思潮也在产生并获得硕果。元明清时代的许多不能入仕的文人和一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生活和社会底层，了解民众的疾苦与需求，他们在创作形式上离开了高雅的诗文，主张通俗文学。元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元杂剧和散曲，明代和清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长篇章回小说、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传奇（戏剧）。当然，诗、词、曲、散文及短篇文言小说等形式的文学也有不小的收获。从元明清三个朝代寓言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收获也是颇丰的。

仅从元代前期创作的寓言来看，数量是很少的。仅有邓牧的《二戒》、王恽的《鱼叹》、白珣的《湛渊静语》中的“囫囵吞枣”、虞韶《铁杵磨针》等作品传世。而在元